

反腐败、企业家能力与企业创新*

王健忠, 高明华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5)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企业家能力指数(CCEI^{BNU}), 探究企业家能力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 结合当前反腐败的背景, 深入研究反腐败对企业家能力与企业创新的影响, 并进行实证检验, 得出如下结论: (1) 企业家能力的提升对企业创新有积极作用。非国有企业中企业家能力和企业创新显著正相关, 但在国有企业中只有企业家关系网络能力与企业创新正相关。(2) 反腐败增加了企业家寻租的成本和难度, 企业家能力会更多地配置到生产领域, 促进企业增加创新投入, 因此, 反腐败会强化企业家能力对创新的促进作用。(3) 进一步对企业分类研究发现, 反腐败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创新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并会加强非国有企业的企业家能力对企业创新的正效应, 对于国有企业来讲, 反腐败加强了企业家人力资本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 而企业家关系网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不再显著。

关键词:反腐败; 企业家能力配置; 企业创新

中图分类号:F27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17)06—0036—17

一、引言

面对国内经济下行和经济结构调整转型的压力, 企业创新必然是下一步经济发展的重头戏。近年来, 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虽然进步明显,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显著差距, 因此, 研究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就成为一个重要课题。企业家作为企业创新的主体, 其能力将决定企业的发展轨迹, 对创新有着最直接和最根本的影响。由于企业创新行为具有高投入和高风险性, 加之外部市场机制不完善, 信息不完全和竞争不充分, 企业往往需要政府看的见的“扶持之手”来帮助企业获得诸如信贷、政策等方面的支持。事实上, 官员作为政府行为的执行主体, 如果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 政府行为就可能演变为官员追求个人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行为, 由此引发企业家寻租和官员的腐败, 这将会影响企业创新的各个环节。

对照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 改革开放后,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截至2010年GDP平均增长率为9.91%。但在经济增长的背后, 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官员腐败, 进入21世纪以来, 尽管反腐力度不断加大, 但是, 一些官员的贪腐数额、级别非常令人震惊, 甚至有的地方出现了“塌方式”的腐败现象, 这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 也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事实上, 大部分政府官员的腐败会涉及企业(Klitgaard, 1998)。不难看出, 腐败官员背后往往伴随着其豪华的商人“朋友圈”, 这折射出政商关系的隐秘与复杂。寻租和腐败会导致企业家能力从生产领域错配到非生产领域, 并会产生对企业家能力的“挤出效应”, 对企业创新不利。反腐败一方面减少了企业家通过非法渠道为企业和个人获利的寻租行为; 另一方面, 可以防止政府官员将“掠夺之手”伸向企业, 使企业家将全部精力用于企业的创新发展。特别是十八大后, 中共中央反腐的力度空前加大, 那么, 企业家能力是否会在政商环境的改善中得到更好的发挥, 并促进企业创新呢? 本文将从企业家能力的角度, 利用中国上市公司企业家能力指数, 着重分析反腐败、企业家能力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

本文的主要贡献: (1) 丰富了对企业创新关键影响因素的研究, 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 探究了企业家能

收稿日期: 2017-02-13

*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研究”(14ZDA02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深入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研究——基于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视角”(12AZD059)。

作者简介: 王健忠(1989-), 男, 山东泰安人, 博士研究生, 研究领域是公司治理, E-mail: wjz19890705@163.com; 高明华(1966-), 男, 山东禹城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领域是公司治理, E-mail: mhgao@bnu.edu.cn。通讯作者: 高明华。

力对创新的影响机理,并通过研究反腐败对企业家能力与企业创新关系的影响,从一个新的视角展开对企业创新的研究;(2)提供了新的数据支撑,既往的研究并没有完整反映中国企业家能力的数据库,本文利用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的企业家能力指数数据库,重新认识和检验了反腐败、企业家能力和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

二、文献回顾

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企业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David(1994;2010)从企业内部探索了商业模式和企业战略、公司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除了对企业内部因素的思考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企业外部环境对创新的影响。陆国庆等(2014)证明了政府补贴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具有积极的影响;王文春(2014)认为,房价的上涨对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毛其淋等(2014)认为,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总体上可以延长企业的创新期。考虑到中国的国情,潘越等(2015)从地方司法保护的角度来说明其对创新的影响,并提出改革司法环境、减少企业环境的不确定性有利于企业创新。

上述研究中,不管是内部因素还是外部因素,创新活动最终还要受到具体决策者的影响。也就是说,内部影响因素中的企业规模和外部影响因素中的政府支持及司法环境等,有可能不是影响企业创新的根本因素,最根本和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应是企业家,企业家作为企业的灵魂人物,是企业行为的最终决策者。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企业高管个人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如高管任期、年龄(刘运国、刘雯,2007)、性别(李小荣、刘行,2012)、过度自信(林慧婷、王茂林,2014)等,企业家的这些特征最终影响的是企业家能力。企业家能力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一种复合的能力即能力束,不能理解为单一的、孤立的能力(高明华、焦豪,2015)。企业家能力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不可忽略,并且经济结构等因素对两者关系起到调节作用(贺小刚、李新春,2005)。杜雯翠等(2013)进一步检验了在不同市场结构中企业家能力与经营绩效的关系,研究表明,在市场集中度比较低的情况下,企业家能力对提高企业绩效有“加速器”的作用。

如何让企业家能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是非常重要的命题,正确处理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关系是重中之重,其中,反腐败是保证和谐政商关系的前提。反腐败是世界各国政府的艰巨任务,特别是处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腐败问题的复杂性,很难对腐败做出精确的定义。学术界一般认为,腐败是国家公职人员为获得个人利益而对公共权力的滥用(于风政,2003)。现实情况是,官员腐败往往与企业高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官员腐败与企业家能力关系的研究文献相对匮乏,与之相关的是对企业家社会关系资本的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的观点是企业家的政治资本关系对企业创新有较大影响。陈爽英等(2010)研究发现,企业的政治资源对企业的研发倾向有消极的影响;袁建国(2015)的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并认为存在政治资源的“诅咒效应”,这种效应会在政治关联的第三年开始显现。政治关联的背后不乏存在利益输送,而利益输送极有可能存在权力寻租,引发腐败现象。腐败到底是影响创新的绊脚石还是润滑剂,Prashanth(2008)利用非洲企业层面的数据研究表明,腐败对企业的产品创新不利。李后建等(2015)就同样的问题得出贿赂等腐败活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是创新的“润滑剂”,但随着腐败程度的提高会变成创新的“绊脚石”,二者是一种倒“U”型的关系。

总之,现有的研究将反腐败、企业家能力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割裂开来,尚未对三者之间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企业家能力指数的微观数据和反腐败的宏观数据,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反腐败、企业家能力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

三、理论分析与假设

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将遵循以下分析脉络。首先,明确企业家对创新的影响机制。企业家能力将直接影响企业家对创新方向的把握、创新动力的提供和创新物质的保障。因此,企业家能力越强,对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大。其次,反腐败会带来企业家能力配置的转型。在腐败存在的情况下,企业家可能主动寻租或者被官员“逼租”,这将会造成企业家能力从生产领域错置到非生产领域,进而影响企业创新的进程;反腐败将重构政商关系,从而增强企业家能力对创新的积极作用。最后,考虑产权性质可能对上述关系产生的影响,因为反腐败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影

1. 企业家能力对创新的促进作用

(1) 企业家对创新的影响机制。是什么决定了企业创新的成败?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企业家是否有企业家精神。因此, 需要先探究企业家对企业创新影响的机制, 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 方向机制。企业家指引创新的方向。企业家运用自身知识、市场信息及社会发展情况, 提出新的产品和服务的最终目的, 并发现创新的机遇。第二, 动力机制。企业家是创新的核心动力。企业家拥有一般员工所缺少的战略眼光及个人魅力, 不仅能克服种种困难, 敢于承担失败风险, 更重要的是有社会责任意识, 因此, 企业家是整个创新过程的动力源泉。第三, 保障机制。企业家为创新提供物质、资金和人员保障的支持。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 企业家要提供创新所必要的资金供给, 并组建研发团队。

(2) 企业家能力评价。研究企业家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 需要对企业家能力进行评价, 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是保证研究客观性的前提。Man 等(2002)提出了中小企业的企业家能力维度, 包括机遇、关系、组织、概念、战略、承担六个方面能力; Edgar 等(2005)将企业家能力细化为 19 个指标,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发现和评估商业机遇的能力、决策能力、网络能力、口语交际能力; Dimitratos 等(2014)提出了跨国公司集团子公司企业家的一组全面综合能力, 其中包括创新、风险承担、积极性、学习能力、跨国公司内外关系网络能力等。国内一些学者也开始注重对企业家能力的研究, 分别从管理、战略、政府关系及社会关系方面评价企业家能力(贺小刚、李新春, 2005)。以上关于企业家能力的研究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 企业家能力的划分问题, 要么能力划分过于狭隘, 不足以涵盖企业家能力的所有方面; 要么指标过于宽泛, 不能明确企业家的核心能力。第二, 关于企业家能力的测量问题, 大多数研究采取主观性较强的问卷调查形式, 最终会影响企业家能力测量的客观性。高明华等(2012, 2014, 2016)在总结以上两个方面的同时, 将企业家能力划分为人力资本、战略领导能力、关系网络能力、社会责任能力四个维度, 分别在四个维度下设计二级指标, 如表 1 所示。

表 1 企业家能力指数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标准
人力资本 (EH)	1. 企业家 (CEO) 的最高学历	高中及以下和未披露(0 分); 专科(0.35 分); 本科(0.7 分); 硕士和博士(1 分)
	2. 企业家工作年限	0~10 年(0 分); 11~20 年(0.35 分); 21~30 年(0.7 分); 31 年及以上(1 分)
	3. 企业家工作经历的变更	0 家(0 分); 1~2 家(0.5 分); 3 家及以上(1 分)
	4. 是否担任其他公司的独立董事	是(1 分); 否(0 分)
	5. 是否有海外留学经历(半年以上)	是(1 分); 否(0 分)
	6. 是否有海外工作经历(半年以上)	是(1 分); 否(0 分)
	7. CEO 的选聘路径	市场选聘(1 分); 内部任命(0 分)
关系网络力 (EN)	8. 政府官员是否到企业访问	是(1 分); 否(0 分)
	9. CEO 是否陪同省部级及以上政府官员出国访问	是(1 分); 否(0 分)
	10. 是否担任党代表	全国(1 分); 省(0.7); 省(0.7); 地市以下(0.35); 否(0 分)
	11. 是否担任人大代表	全国(1 分); 省(0.7); 省(0.7); 地市以下(0.35); 否(0 分)
	12. 是否担任政协委员	全国(1 分); 省(0.7); 省(0.7); 地市以下(0.35); 否(0 分)
	13. 是否在军队任过职	是(1 分); 否(0 分)
	14. CEO 任职期间是否获得相关荣誉称号	全国(1 分); 省部级(0.5); 地市及以下或没有(0 分)
社会责任力 (ER)	15. 是否在行业协会任职	全国(1 分); 省级(0.5); 地市及以下或没有(0 分)
	16. 是否曾经在政府部门任职	中央(1 分); 省部级(0.7); 地市级(0.35); 没有(0 分)
	17. 企业是否在 2013 年捐赠慈善事业	是(1 分); 否(0 分)
	18. 是否在非营利组织兼职(如理事等)	是(1 分); 否(0 分)
	19. 2013 年度 CEO 个人是否被证监会谴责	是(-1 分); 否(0 分)
	20. 有没有产品质量或安全等问题的重大投诉事件	是(-1 分); 否(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标准
社会责任力 (ER)	21. 员工收入增长率是否不低于公司利润增长率	是(1分);否(0分)
	22. 有无股息分红	是(1分);否(0分)
	23. 有无贷款诉讼	是(-1分);否(0分)
战略领导能力 (ES)	24. 高管贡献	标准化
	25. 国际化程度	海外收入/总收入
	26. 企业员工数	标准化
	27. 企业总资产	标准化
	28. 企业在行业中的地位	按行业(18)标准化
	29. 企业有无完整的 ERP 系统	有(1分);无(0分)
	30. 企业有无制定战略目标和计划	有(1分);无(0分)

资料来源:高明华等. 中国公司治理分类指数报告 No. 15[M]. 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6

(3)企业家能力对创新影响的理论分析。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企业家人力资本与企业创新的方向机制。企业家人力资本水平与企业创新高度相关。高层梯队理论和管理者特征理论认为,由于受到市场环境复杂性的影响,企业家的决策受到其既有知识结构和价值认识如企业家接受教育的程度、工作经历等方面的影响。黄继承等(2013)认为,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背景特征蕴含了较多的信息,并会影响企业价值。企业创新行为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企业家不仅需要创新的激情,更要有把握全局的能力,其受教育水平越高,他们在收集、判断和处理信息方面的能力就越强,更能准确判断未来市场的方向,抓住创新的机遇。因此,企业家人力资本水平对企业创新有积极的影响。

第二,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和企业家社会责任能力与企业创新的动力机制。企业创新关乎企业的生死存亡,而企业家的战略能力领导能力和社会责任能力对于企业创新起着决定作用。Vassilis(1998)研究发现,CEO的特征特别是战略领导能力对技术创新有重要的积极作用;武亚军(2013)认为,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阶段,企业家“战略式框架”思考和“悖论整合”的思维模式,将会使企业获得长期发展的竞争优势。因此,企业家战略领导和决策能力将会对创新产生重要影响。企业家社会责任能力也是企业家创新的动力,企业不仅关注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要关注其他利益相关者,企业社会责任会对企业技术创新有积极的作用(周璐、王前锋,2013)。首先,企业家要以保证股东利益为己任,并及时披露相关信息,减轻市场的信息不对称,能增强投资者的投资意愿,缓解企业创新的融资压力;其次,企业家对其他利益相关者如消费者承担社会责任,就会不断地开发新技术并应用新工艺,生产一系列更环保、更人性化的优质产品。

第三,企业家关系网络能力与企业创新的保障机制。由于法规不健全,市场不透明,企业会通过建立强大的关系网络,一方面通过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可以在企业创新资源获得上处于优势地位;另一方面,企业想通过关系网络来减少各种繁文缛节,尽快取得政府的各项许可,因为市场机遇很可能稍纵即逝(Leff, 1964)。企业的关系网络越强,也就意味着企业越容易获取各种创新资源。但是,这种关系网络的持续性要依赖于健全的法律制度和成熟的市场环境。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₁: 企业家能力越强,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强。

2. 反腐败、企业家能力和企业创新

企业家能力对企业创新至关重要,但其对创新的作用还会受到政企关系的影响。本文将企业家的活动分为两类: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企业家选择实施创新型战略还是实施关系型战略,取决于两种发展战略的成本与收益,也将决定企业家能力进行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的配置结构,其中,政府官员的腐败将影响企业家能力的配置(Baumol, 1990)。中国处于转型时期,政府拥有各种审批权,企业为了获得关键资源,可能主动向政府官员寻租。另一种情况,在财政分权后,地方政府官员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可能在一些审批环节设置关卡对企业家“逼租”,企业为了创新活动不受干扰,不得不支付租金。

前一种情况下,企业家为寻求和维持与官员的特殊利益关系,不仅要耗费有限的精力和资源,有的甚至成为政治人物的附庸,还要承担官员失势的风险,这不仅无助于企业家能力的提升,还使得企业家能力向非

生产活动方向配置,并且会对企业创新活动产生“挤出效应”,即使企业获得了一些关键资源,也会将其用于短期获利较大的项目,而不是用于高风险性的创新活动(贺小刚等,2013;杨其静,2011),企业最终会丧失核心竞争力。后一种情况,因为企业创新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企业产品的研发及上市过程中的某些环节必然要受到政府部门的干预,而腐败的发生必然会加剧这种不确定性(Anokhin,2009)。官员腐败行为具有武断性和任意性(Hoffman,2002),所以,企业家很难预料到即将发生的腐败行为。一般而言,腐败高发的地区,其法制环境也不理想,企业家的维权成本很高,往往不得不服从于各种“潜规则”,这不仅会延缓企业创新的进程,使得不确定性增加,还有可能因涉嫌“行贿”而蒙受声誉损失,企业将会用获得的利润来弥补这种不确定性所产生的高额成本,使得企业面临的风险增加,最终企业的创新收益减少,因此,吸引企业家创新的门槛变高,造成企业家创新动力不足。

不论哪种情况,都导致了企业家进行生产性活动的时间减少,冒险和创新的方向成了行贿和寻租,这直接导致企业家能力的配置转向了非生产领域。反腐败增加了企业家政治关联的成本,如果政治关联的成本大于企业创新的收益,那么企业家自然会将重点放在企业创新上(党力等,2015),迫使企业不得不改变已有的“拉关系”的策略,企业家能力的“错位配置”会得到改善,企业家维护政治关系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对企业家能力的“挤出效应”降到最低,还可以消除不合理的官商关系的“示范效应”,保证企业家专心致力于创新。同时,反腐败将官员设租通道关闭,改变了既有的“潜规则”,畅通了创新的渠道。无疑,反腐败会降低企业的成本,增加创新的机会和收益,释放企业家创新的激情和动力,企业家能力将更多地向创新方向配置。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₂:反腐败力度越大,企业家能力对创新的正相关关系就越强。

3. 产权性质、反腐败与企业创新

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会受到产权性质的影响。首先,国有企业具有政策工具的性质(戴锦,2013),承担着国家的一些特殊任务,因此,在政策和融资方面,政府对国有企业有内在的偏好。其次,国有企业的高管任命还没有摆脱行政化干部选拔的模式,造成高管身份亦官亦商。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目标的多元性,导致国有企业创新乏力;另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高管存在一定的薪酬限制,高管对提高企业效率和创新能力的动力可能不足,而将更多的精力转向对政治身份和地位的追求上(李小荣、董红晔,2015),这不仅是对企业家能力的一种浪费,而且由于追求政治前途而极易发生权钱交易和利益输送等问题。基于此,可能造成国有企业的企业家能力对创新的作用有限。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反腐败似乎也很难促使国有企业高管将企业家能力全部用于生产性活动,激发企业创新。事实上,由于国有企业存在多重委托代理关系,政府主管官员拥有对国有企业的剩余控制权,而无法分享企业资产的剩余索取权,加上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天然关系,这可能导致国有企业高管与官员合谋窃取国有资产而无暇创新,引发“隐形腐败”,如官员安排亲属进入国有企业任职或者直接获得公司股份,甚至“吃空饷”等。随着强力反腐,官员的腐败网络被打破,国有企业高管与官员勾结合谋的成本提高,这将为一系列国有企业改革措施的跟进铺平道路,国有企业高管会逐渐将其精力放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上,并将对创新产生积极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₃:相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企业家能力对创新的正相关关系更强

H₄:相比国有企业,反腐败力度越大,民营企业企业家能力对创新的正效应更大。

四、模型和方法

1. 指标选择

(1)反腐败的度量。反腐败可用三个变量来表示:一是直接表示法,采用除西藏自治区外30个省份公职人员犯罪立案数来表示,包括贪污受贿及渎职侵权案件的总数。公职人员犯罪立案数到底是衡量腐败还是反腐败的指标存在一些争议,但公职人员的犯罪立案数无疑是反腐败力度的直接体现,对该指标,本文在回归中采用对数形式。二是间接测量方法,选取两个指标:中央领导换届,2012年中央领导换届,之后便开始强力反腐败,本文以2012年为节点,如果时间处于2012年及以后,则赋值1,否则为0;巡视组巡视,2013年开始启动巡视组巡视,如果2013年巡视组巡视过该地区,则赋值1,否则赋值为0。2013年共有两轮巡视,巡视地区分别为湖北、内蒙古、重庆、贵州、江西、山西、吉林、安徽、湖南、广东、云南。本文在稳健性检验

部分将采用中央领导换届和巡视组巡视来度量反腐败的水平。

(2)企业家能力的度量。本文采用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高明华教授课题组(2012,2014,2016)开发的企业家能力指数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企业家能力分为四个维度,将四个维度的指标得分通过简单平均便得到企业家能力总指数(CCEI^{BNU})。

(3)企业创新的度量。由于创新过程复杂多变,因此,寻找合理的指标来衡量创新是非常重要的。综合已有文献来看,可以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方面来衡量企业创新。本文借鉴学术界的普遍做法,将研发经费作为衡量创新投入的一个重要指标(温军、冯根福,2012),通过Wind数据库得到2010—2013年上市公司的研发经费,为了结果的稳健性,在回归分析中使用研发经费的对数形式。另外,衡量创新产出常用的指标是企业的发明专利授权数量,本文将继续沿用企业发明专利授权数量作为衡量企业创新产出的指标,并进行稳健性检验。

此外,还应该考虑一些控制变量的影响,包括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资产报酬率、每股现金流、企业年龄、市场化指数等。

2.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2010—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其中企业家能力指数数据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公司治理分类指数数据库”之“企业家能力指数数据库”,企业研发经费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各地区公职人员犯罪数来源于中国检察年鉴,其余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其中,企业家能力只有2011年和2013年两年的数据,为了增加样本,本文剔除了CEO变动的企业,并用2013年的数据代替2012年,用2011年的数据代替2010年,因此,本文得到了2010—2013年四年的连续的平衡面板数据。表2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	平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EH</i>	企业家人力资本	28.952	11.351	0	89.067
<i>EN</i>	企业家关系网能力	11.636	12.039	0	66.667
<i>ER</i>	企业家社会责任能力	70.437	13.929	28.571	100
<i>ES</i>	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	28.467	11.552	1.808	89.478
<i>CCEI^{BNU}</i>	企业家能力总指数	34.873	6.805	18.687	69.579
<i>rfunds</i>	创新投入(对数形式)	0.040	0.043	3.60E-06	0.533
<i>yr</i>	政府换届	0.574	0.494	0	1
<i>dcrim</i>	犯罪立案数对数	22.454	6.022	8.202	46.32
<i>xs</i>	巡视组巡视	0.333	0.471	0	1
<i>market</i>	市场化指数	29.289	22.091	0.980	63.990
<i>salary</i>	公职人员工资	55786.110	17096.13	27751.00	91983.00
<i>ipat</i>	发明专利授权数量	26.314	319.068	0	12,827.00
<i>zcbcl</i>	资产报酬率	0.058	0.075	-0.428	2.935
<i>mgxj</i>	每股现金流	-0.356	1.109	-16.870	12.380
<i>age</i>	企业上市年龄	7.625	5.823	0	23
<i>lgsize</i>	企业规模	21.760	1.186	18.880	27.390
<i>fl</i>	资产负债率	0.410	0.227	0.009	2.910

资料来源:本文根据Stata计算整理

3. 模型设定

模型一:企业创新投入为因变量,企业家能力为自变量的回归模型:

$$rfunds_{i,t} = \beta_0 + \beta_1 eabi_{i,t} + \beta_2 X_{i,t} + U_{i,t} \quad (1)$$

模型二:企业创新投入为因变量,引入企业家能力和反腐败力度交叉项:

$$rfunds_{i,t} = \beta_0 + \beta_1 eabi_{i,t} + \beta_2 dcrim_{i,t} \times eabi_{i,t} + \beta_3 dcrim_{i,t} + \beta_4 X_{i,t} + U_{i,t} \quad (2)$$

模型中, $rfunds_{i,t}$ 为研发经费, 在回归中采用其对数形式; $eabi_{i,t}$ 是第 i 个公司第 t 年的企业家能力指数, 包括了企业家能力总指数 ($CCEI^{BNU}$) 及四个分项指数: 企业家人力资本 (EH)、企业家关系网络能力 (EN)、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 (ES) 和企业家社会责任能力 (ER), 并对以上分项能力指数进行分别验证; $dcrim_{i,t}$ 为公职人员犯罪立案数, 在回归中本文采用这个变量的对数形式; $X_{i,t}$ 是控制变量; $U_{i,t}$ 表示残差项。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1. 企业家能力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来检验企业家能力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 并认为企业家能力对企业创新具有促进作用。首先, 通过全样本回归检验企业家能力与企业创新的关系, 如表 3 的第 (1) 列 ~ 第 (4) 列所示, 考虑到全样本中关于企业家能力与创新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可能受到 2012 年中央政府领导换届后反腐力度加大带来的影响, 本文剔除 2012 年之后的样本再次检验企业家能力和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 回归结果如表 3 的第 (5) 列和第 (6) 列所示。其中, 因变量为研发经费的对数, 自变量为企业家能力指数。

表 3 企业家能力与创新关系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全样本	全样本	全样本	全样本	反腐前	反腐前
	创新投入	创新投入	创新投入	创新投入	创新投入	创新投入
企业家能力总指数	0.0171 *** (6.46)	0.0133 *** (5.07)			0.0270 *** (4.80)	
战略领导能力			0.00141 (0.97)	0.000748 (0.52)		0.0313 *** (8.42)
社会责任能力			0.00488 *** (4.04)	0.00448 *** (3.73)		0.0156 *** (4.58)
人力资本			0.00345 ** (2.23)	0.00356 ** (2.36)		-0.000542 (-0.15)
关系网络能力			0.00790 *** (4.59)	0.00426 ** (2.55)		0.0119 *** (2.9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4378	4077	4378	4077	1910	1910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 t 值

资料来源: 本文整理

表 3 的第 (1) 列和第 (2) 列是企业家能力总指数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回归结果表明, 企业家能力总指数对创新的影响显著为正。这说明, 企业家能力越强, 对创新的促进作用也就越大。假设 H_1 得到验证。

表 3 的第 (3) 列和第 (4) 列检验了企业家能力分项指数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得到了一致的结论, 其中, 第 (3) 列只考虑企业家能力分项指数对创新的影响, 第 (4) 列加入了其他控制变量。各分项指数中, 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 (ES) 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但是这种关系并不显著。这可能意味着企业家的短期行为仍占据主要地位, 对于具有长期效应的研发创新并没有表现出普遍的热情。企业家人力资本 (EH) 与企业创新显著正相关, 这符合理论的预期, 表明企业家人力资本越强, 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就越大。企业家社会责任能力 (ER) 对企业创新有积极的作用, 企业家社会责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利益相关者的满意程度, 提升公司价值 (王端旭、潘奇, 2011), 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 对创新有积极的作用。企业家关系网络能力 (EN) 同样对创新的影响显著为正, 这是因为, 企业家关系网络一方面可以为企业发展带来一定的资源; 另一方面, 在社会各方面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 关系网络可能为企业寻租提供便利,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创新投入的增加。

表 3 的第 (5) 列和第 (6) 列考察了在 2012 年中央政府换届之前的企业家能力与创新的关系。在换届之前, 反腐的力度并没有足够的威慑力, 企业家能力总指数 ($CCEI^{BNU}$) 及分项指数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 (ES)、

企业家社会责任能力(ER)和企业家关系网络能力(EN)依然与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企业家人力资本(EH)对创新存在消极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一些企业家越来越热衷于学位的帽子,通过MBA和EMBA等在职培训来扩展自己的关系和人脉,企业家人力资本并没有实际的提高,不仅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有限,还可能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因此,这种影响是不显著的。

国有企业负责人大都由政府选拔并且具有一定的行政级别,其行为往往受到政府干预;非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大多来自市场选聘抑或来自家族内部或直接就是创始人,其行为与企业家能力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将样本分为国有控股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检验不同所有制下企业家能力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另外,一定数量的政府补贴可能对企业创新带来积极的影响,但是,企业家也可能通过寻租来获得高额补贴,这又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企业家能力。这里将补贴分为低补贴和高补贴,分别来看两种情况下企业家能力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表4为不同产权性质和补贴力度下企业家能力和创新关系的回归结果。

表4 不同产权性质和补贴力度下企业家能力和创新关系的回归结果

变量	非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低补贴		高补贴	
	(1)	(2)	(3)	(4)	(5)	(6)	(7)	(8)
	创新投入	创新投入	创新投入	创新投入	创新投入	创新投入	创新投入	创新投入
企业家能力总指数	0.0114*** (4.22)		0.00998 (1.12)		0.0186*** (6.44)		0.000365 (0.05)	
战略领导能力		0.00140 (0.95)		-0.00348 (-0.69)		0.00376** (2.39)		-0.00494 (-1.22)
社会责任能力		0.00420*** (3.40)		0.00118 (0.28)		0.00509*** (3.78)		0.00115 (0.40)
人力资本		0.00298* (1.92)		0.00140 (0.25)		0.00512*** (3.15)		-0.00512 (-1.22)
关系网络能力		0.00462*** (2.74)		0.0186*** (3.18)		0.00454** (2.47)		0.00607 (1.4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620	3620	510	510	3274	3274	826	826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激烈的市场竞争涌现出了大批的职业经理人,高额的薪酬吸引了大批高能力的经理人进入非国有控股企业。表4的第(1)列是非国有控股企业企业家能力总指数与创新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在控制了相关的控制变量以及年份、行业后,非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家能力总指数与创新之间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第(2)列是非国有控股企业企业家能力分项指数与创新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非国有控股企业企业家社会责任能力(ER)、企业家人力资本(EH)和企业家关系网络能力(EN)对企业创新投入有积极的影响,但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ES)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第(3)列和第(4)列分别是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家能力总指数(CCEI^{BNU})和各分项指数的回归结果,在控制了相关的变量之后,第(3)列的国有控股企业企业家能力总指数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从第(4)列的分项指数来看,国有控股企业只有企业家关系网络能力(EN)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对国有控股企业存在内在的偏好,比非国有控股企业更容易通过关系网获得信贷和补贴,因此,对研发投入有积极的作用。其他分项指数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ES)、企业家社会责任能力(ER)和企业家人力资本(EH)则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国有控股企业的高管来自政府的任命,很难摆脱行政化的领导方式。即便是具有高能力的高管进入国有企业,但由于薪酬限制及体制束缚,企业高管更有可能放弃创新而追求政治地位的提升。

表4的第(5)列回归结果显示,低补贴时企业家能力与创新之间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第(6)列的分项指数也同样显著为正。但是,第(7)列的高补贴时的企业家能力总指数和第(8)列的分项指数与创新之间的

关系不显著,这是因为政府补贴是政府支持企业创新的一个重要方式,政府补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创新的融资约束,从而可以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企业为了获得高的政府补贴必然要和政府官员保持良好关系,也可能出现寻租等现象,特别是在反腐败力度比较小的地区,补贴往往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会对企业家能力造成一定的损害。另外,企业获得了高额补贴也不一定会全部用于企业的研发投入。

2. 反腐败、企业家能力与创新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

前面对企业家能力和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验证,那么,反腐败对二者关系会产生什么影响?随着中央反腐力度的加大,大批腐败官员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不仅对政府官员有很大的震慑作用,而且也迫使企业改变以往拉关系的策略。因此,本文推测,反腐败能够优化企业家才能配置,减小官员腐败对企业家能力的“挤出效应”,激发企业家创新的动力,从而促进企业创新。表5是企业家能力、反腐败和企业创新三者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其中,采用企业创新投入的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为企业家能力以及企业家能力与反腐败的交互项,交互项表示反腐败如何加强企业家能力对创新的积极作用。为了避免方程设定的偏误,不仅对企业家能力总指数,还要对企业家能力的分项指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反腐败、企业家能力及创新关系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创新投入	创新投入	创新投入	创新投入	创新投入
反腐	1.077*** (9.96)	1.063*** (9.76)	0.304*** (5.52)	0.292*** (5.32)	0.297*** (5.43)
企业家能力总指数	0.0128*** (4.77)				
反腐×企业家能力总指数	0.00777* (1.90)				
战略领导能力		-0.00297** (-2.07)			
反腐×战略领导能力		-0.00111 (-0.48)			
人力资本			0.0232*** (4.41)		
反腐×人力资本			0.00591** (2.34)		
关系网络能力				-0.00510*** (-3.09)	
反腐×关系网络能力				0.00204 (0.80)	
社会责任能力					0.00646*** (5.20)
反腐×社会责任能力					0.00354* (1.7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1.53*** (-15.21)	-11.93*** (-15.77)	-11.62*** (-16.55)	-11.71*** (-16.69)	-11.40*** (-16.24)
观测值	4309	4309	4309	4309	4309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表5为企业家能力、反腐败和创新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为了避免回归中交叉项的多重共线性,这里

对分项指数及其交叉项分别进行回归。第(1)列为企业家能力总指数的回归结果,第(2)列~第(5)列是企业家能力分项指数的回归结果。第(1)列中反腐败、企业家能力总指数和交叉项对创新投入的影响显著为正,这说明,反腐败力度的加大可以促进企业的创新,并且反腐败力度越大,越会加强企业家能力对创新的正效应。假设 H_2 得到验证。这说明,反腐败让企业家能力更多的用在创新方面,激发了企业家创新的动力。

第(2)列中企业家战略能力(ES)与反腐败的交叉项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这说明,反腐力度的加大并没有增强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衡量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反腐败对国内现有的政商关系产生了冲击,而无法对企业国际业务产生影响,造成交叉项并不显著。第(3)列中反腐败、企业家人力资本能力(EH)及交叉项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显著为正,这说明,反腐败强化了企业家人力资本对创新的积极影响。有意思的是,与表3、表4中企业家关系网络能力(EN)相比,第(4)列在加入了与反腐败的交叉项后,企业家关系网能力(EN)与创新的关系显著为负,企业家关系网络能力(EN)对研发投入产生了消极作用。但企业家关系网络能力(EN)与反腐败交叉项的系数为正,说明反腐败增加了企业政治寻租的成本,减弱了关系网络能力(EN)对企业创新的负效应,一些企业开始改变依靠政治寻租获得发展的策略,但是,这种关系并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反腐败对政商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企业家需要一定时间调整与政府的战略关系,但从长期来看,反腐败将有利于构建新型的政商关系。第(5)列反腐败、企业家社会责任能力(ER)及交叉项的系数为正,这说明,随着反腐败力度的提高,企业家社会责任能力对于创新的正效应会得到强化。这是因为,企业家在将资金用于社会服务时,企业会获得较好的声誉,从而会吸引更多的投资,更加利于创新。

3. 不同所有制的回归结果

在前面的研究中,本文发现,产权性质将影响企业家能力对创新的作用,国有控股企业中只有企业家关系网络能力(EN)对企业的创新有促进作用,因此,本文将区分国有控股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检验反腐败对企业家能力与创新关系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分所有制反腐败及其与企业家能力交叉项回归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非国有企业 创新投入	非国有企业 创新投入	非国有企业 创新投入	非国有企业 创新投入	非国有企业 创新投入	国有企业 创新投入	国有企业 创新投入	国有企业 创新投入	国有企业 创新投入	国有企业 创新投入
反腐	2.452*** (10.47)	1.052*** (9.30)	1.682*** (9.54)	1.027*** (9.02)	0.253*** (4.38)	1.358*** (3.71)	1.266*** (3.49)	1.357*** (3.80)	1.350*** (3.68)	1.393*** (3.83)
企业家能力总指数	0.0493*** (6.71)					0.00206 (0.21)				
反腐×企业家能力总指数	0.00992** (2.22)					0.0116 (0.96)				
战略领导能力		0.00055 (0.38)					-0.00914* (-1.76)			
反腐×战略领导能力		-0.0035 (-1.42)					0.00555 (0.75)			
人力资本			0.0240*** (4.42)					0.0110* (1.82)		
反腐×人力资本			0.00436* (1.67)					0.0156** (1.98)		
关系网络能力				-0.00347** (-2.10)					-0.00145 (-0.25)	
反腐×关系网络能力				0.000596 (0.23)					0.00267 (0.34)	
社会责任能力					0.00787*** (5.97)					0.00260 (0.58)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非国有企业 创新投入	非国有企业 创新投入	非国有企业 创新投入	非国有企业 创新投入	非国有企业 创新投入	国有企业 创新投入	国有企业 创新投入	国有企业 创新投入	国有企业 创新投入	国有企业 创新投入
反腐×社会责任能力					0.00392* (1.78)					-0.00222 (-0.3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8.28*** (-20.42)	-20.91*** (-25.75)	-19.75*** (-23.25)	-20.94*** (-25.65)	-20.75*** (-26.87)	-14.38*** (-7.48)	-14.83*** (-7.84)	-14.10*** (-7.46)	-14.37*** (-7.59)	-14.20*** (-7.48)
观测值	3851	3851	3851	3851	3620	519	519	519	519	519

注：*、**、***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表 6 的第(1)列是非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家能力总指数(CCEI^{BNU})、反腐败以及两者交叉项与企业创新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在控制了相关的控制变量、年份和行业以后,企业家能力总指数、反腐败以及二者交互项的系数是显著为正的。这表明,对于非国有控股企业来说,反腐败促使企业家能力向创新方向配置,并且减少了不当政府干预对企业家能力造成的挤出效应,因此,反腐败对非国有控股企业的创新有积极作用,并且反腐力度越大,企业家能力对创新影响的正效应就越明显。从第(2)列~第(5)列的四个分项指数看,第(2)列中战略领导能力与反腐败的交叉项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说明反腐败并没有导致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对非国有控股企业产生更强的创新作用;第(3)列的回归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反腐败及其交叉项都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正影响,这说明对非国有企业来讲,反腐败使得企业家人力资本更多地用在了企业创新战略上,因此,加强了人力资本能力(EH)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第(4)列中非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家网络能力(EN)对创新的回归结果显著为负,说明非国有控股企业过分注重企业关系网络特别是政治关联对企业的创新不利,交叉项系数为正,但是不显著;第(5)列企业家社会责任能力(ER)、反腐败及其交叉项对非国有控股企业创新的影响同样显著为正,说明反腐败净化了企业经营环境,强化了社会责任能力对创新的正效应。综上,假设 H₃、假设 H₄ 得到验证。

第(6)列~第(10)列反映了反腐败、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家能力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对国有控股企业来说,反腐败同样对企业创新有正向的影响,但是,企业家能力总指数(CCEI^{BNU})与反腐败的交叉项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反腐败力度对国有企业的企业家能力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没有明显的影响,这与本文的假设一致,这是由国有控股企业具有政策工具性质,以及高管身份具有“亦官亦商”的特殊性导致的,这会造成企业家能力对创新的作用受到种种限制。从分项指数来看,只有第(8)列中对企业创新具有重要影响的企业家人力资本(EH)在加入与反腐败的交叉项后对创新的影响都显著为正,这说明,反腐败增强了人力资本对企业创新的正效应。这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高管虽有部分是公开选聘,但最终决定权还在于上级主管部门,结果还是只从特定的“圈子”中选择。随着反腐力度加大和国有控股企业高管选聘制度的改革,使得国有控股企业的选聘更加严格,企业家内在的能力会越来越受到重视,企业家人力资本(EH)将会得到更好的发挥,进而能够促进创新。同时,第(9)列中企业家关系网络(EN)和交叉项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反腐败改变了国有控股企业依靠关系网络来获得研发资源的现状,使得国有控股企业越来越重视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对创新的作用。

综上所述,国有控股企业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家能力对创新的影响机制并不相同,区别在于企业家能力是否能够按照市场化的要求发挥作用。对于非国有控股企业来讲,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其倾向于聘用能力更强的企业家,并且企业家能力越强,其对企业创新的积极作用就越大。而国有控股企业并没有按照严格的市场化方式来选聘高管,即便具有高能力的企业家进入国有控股企业,也未必能更好地发挥其创新潜能,表 4 列(1)~列(4)的回归结果证明了这一点,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家能力指数中只有关系网络能力对创新有积极的影响,但下文的稳健性检验又进一步证明了这种依靠关系网络来获得创新资源的方法并

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反腐败将冲击现有的政商关系,影响企业家能力的配置,进而影响企业创新,表6的回归结果证明了这一点。回归结果中更有趣的是反腐败对国有控股企业企业家能力配置的影响,在反腐败的背景下,国有企业的关系网络能力不再发挥显著的作用,取而代之的是企业家人力资本开始对企业创新产生积极的作用。这说明,国有控股企业随着反腐败的进行,也在逐渐冲破原有制度对创新的束缚,这就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铺平了道路。

4. 稳健性检验

(1) 由于反腐败变量可能存在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以公务员工资平均水平为工具变量。选择公务员人均工资水平为工具变量,主要有以下原因:公职人员收入水平与反腐败密切相关,公务员的工资水平较低,会造成人才流失,这不仅影响行政效率,还有可能使官员过分依靠灰色收入而造成腐败问题的发生(公婷、吴木銮,2012)。关于国家公职人员工资水平的高低一直是一个存在广泛争议的话题,有学者认为,通过提高公务员工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官员腐败的发生(万广华、吴一平,2012)。表7中的第(1)列通过运用工具变量,企业家能力与反腐败的交叉项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显著为正,这表明,反腐败加强了企业家能力对企业创新的正效应,因此,以上结论支持了文本的观点。

表7 反腐败、企业家能力和创新关系的进一步检验

	(1)	(2)	(3)	(4)	(5)
	工具变量	双向固定效应 (政府换届)	双向固定效应 (巡视组巡视)	泊松回归	泊松回归
	创新投入	创新投入	创新投入	创新产出	创新产出
企业家能力总指数	0.177 *** (7.93)	0.00344 (1.32)	0.00487 ** (2.29)	0.00157 *** (2.99)	0.00609 (0.15)
反腐	4.720 *** (10.57)				0.0697 *** (2.68)
反腐 × 企业家能力总指数	0.0418 *** (6.30)				0.00393 *** (3.32)
换届 × 企业家能力总指数		0.0160 *** (21.15)			
巡视 × 企业家能力总指数			0.00365 * (1.66)		
常数项	-39.54 *** (-14.69)	-13.05 *** (-17.58)	-12.17 *** (-17.22)	-7.818 *** (-12.08)	-4.568 *** (-10.57)
年份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4309	4069	4069	3343	3335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2) 改变反腐败的度量方法,本文采用中央政府换届和巡视组巡视作为反腐败的替代变量,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即在模型中控制年份的固定效应,但不加入反腐败的两个间接虚拟变量。表7的第(2)列和第(3)列分别是政府换届和巡视组巡视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回归结果。在控制了相关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换届和巡视组巡视与企业家能力的交叉项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这与前文的回归结果一致。2012年中央领导人换届后,反腐力度加大,导致企业的资金投向从过去的偏重于加强政商关系转变为偏重于加大创新投入,因为政府换届一般具有政策导向作用(王少飞、官峰等,2014)。2013年以来,中央巡视组开始对不同的地区进行巡视,重点是发现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这使得一些违法乱纪行为得到很大程度的遏制,一方面使得企业经营环境得到改善;另一方面,企业也会做出战略上的调整,将重点放在创新上。这意味着控制腐败的力度越强,企业的创新产出就越多,该结果同样验证了关于反腐败有利于企业创新的理论分析。事实上,企业家的精力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即创新上;二是处理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上。在反腐败力

度强的地区,企业会将工作重心放在创新上而不是忙于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上,进而企业创新能力就会更强。

(3) 改变企业创新的度量方法。在前文中采用的研发经费投入只是衡量创新投入的变量,许多学者将企业的发明专利授权数量作为衡量企业创新产出的重要变量,考虑到结论的可靠性和稳健性,在本文中采用企业发明专利的授权量重新检验了反腐败、企业家能力和创新的关系。表7中的第(4)列采用泊松回归得出企业家能力和发明专利授权数量之间的关系是显著正相关的,得出了和前文一致的结论。第(5)列利用发明专利授权量为因变量进一步检验了反腐败、企业家能力和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其中交叉项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显著为正,反腐败加强了企业家能力对创新的正效应,与前文结论一致。

(4) 表7中的回归结果只采用了企业家能力总指数(CCEI^{BNU})来做稳健性检验,考虑到产权性质和分项指数对结果的影响,在表8中将样本分为国有控股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采用专利授权数量来衡量创新产出并作为因变量,对企业家能力四个分项指数分别进行泊松回归。表8的第(1)列~第(4)列为非国有控股企业的回归结果,第(5)列~第(8)列为国有控股企业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对非国有企业而言,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ES)、企业家人力资本(EH)和企业家社会责任能力(ER)与反腐败的交叉项对企业创新的影响都显著为正,说明控制腐败优化了企业家能力的配置,促进了企业的创新,并进一步支持了前文的观点。第(3)列中的企业家网络能力(EN)对企业创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是由于在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建立和维护企业家关系网络容易使得企业家能力向非生产领域配置,因此,企业家关系网络带给企业各种资源的同时,也会损害企业创新能力的建设,交叉项对企业创新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与前文的结果一致,这可能是因为反腐败的作用虽然已经显现,但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还需要时间。第(5)列~第(8)列探究了国有控股企业反腐败、企业家能力与创新的关系,结果发现,第(6)列中企业家人力资本(EH)与反腐败的交叉项对国有企业创新有显著正的影响,国有控股企业企业家人力资本(EH)对创新的正效应随着反腐败力度的增大而加强。综合第(7)列来看,企业家关系网络能力(EN)与反腐败的交叉项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进一步验证了前文的观点。这说明,反腐败同样增加了国有控股企业政治关联的难度和成本,也带来了国有企业创新模式的变革,使得国有企业开始注重发挥企业家人力资本而非企业家关系网络对创新的作用。

表8 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企业家能力分项指数、反腐败和创新关系的进一步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7)	(8)
	非国有企业 创新产出	非国有企业 创新产出	非国有企业 创新产出	非国有企业 创新产出	国有企业 创新产出	国有企业 创新产出	国有企业 创新产出	国有企业 创新产出
反腐	1.219*** (70.10)	0.191** (2.43)	0.821*** (25.47)	1.167*** (38.43)	0.751*** (12.15)	0.243*** (3.66)	0.407*** (4.96)	0.672*** (10.90)
战略领导能力	0.0486*** (21.87)				-0.000333 (-0.16)			
反腐×战略领导能力	0.00389*** (2.69)				0.000879 (0.38)			
人力资本		0.00957*** (3.89)				0.0311*** (14.02)		
反腐×人力资本		0.00520*** (3.31)				0.0118*** (5.00)		
关系网络			-0.00759*** (-10.98)				-0.000566 (-0.30)	
反腐×关系网络能力			0.000684 (0.55)				0.000491 (0.18)	
社会责任能力				0.00379*** (6.52)				0.00700*** (3.67)
反腐×社会责任能力				0.00287** (2.57)				0.00377* (1.69)
年份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变量	(1)	(2)	(3)	(4)	(5)	(6)	(7)	(8)
	非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创新产出	创新产出	创新产出	创新产出	创新产出	创新产出	创新产出	创新产出
常数项	4.454*** (46.23)	-6.581*** (-7.18)	-28.32*** (-44.93)	-27.81*** (-32.55)	4.450*** (19.78)	-16.80*** (-10.10)	-2.056*** (-3.07)	-19.45*** (-15.34)
观测值	2989	2269	2989	2989	380	372	379	380

注：*、**、***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5) 考虑到企业家能力对创新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同时,反腐败力度加强对二者之间的关系的影响同样存在时滞性。因此,本文继续以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滞后一期变量为因变量进行回归检验。对滞后一期创新投入的回归采用 GLS 的回归方法,对滞后一期创新产出的回归采用泊淞回归的方法,回归结果如表 9 所示。

表 9 考虑创新投入和产出时滞效应的进一步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全样本	全样本	非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创新投入 滞后一期	创新产出 滞后一期	创新投入 滞后一期	创新产出 滞后一期	创新投入 滞后一期	创新产出 滞后一期	创新投入 滞后一期	创新产出 滞后一期	创新投入 滞后一期	创新产出 滞后一期
企业家能力总指数	0.0115*** (3.52)	0.00316** (2.57)	0.0115*** (3.46)	0.00616*** (7.95)	0.0125 (1.03)	0.00369* (1.90)	0.00731* (1.76)	0.00580* (1.86)		
反腐							0.320*** (4.22)	1.828*** (22.67)	0.0774 (0.35)	0.523*** (3.42)
反腐 × 企业家能力							0.000221*** (3.60)	0.000249*** (7.80)		
关系网络能力									-0.000878 (-0.11)	-0.0241*** (-12.67)
反腐 × 关系网络能力									0.00473 (0.50)	0.000829*** (4.91)
常数项	5.669*** (14.67)	0.701 (1.15)	5.676*** (15.47)	0.769 (1.31)	5.794*** (3.21)	3.872*** (6.30)	7.327*** (70.21)	3.304*** (25.85)	8.637*** (48.47)	2.667*** (10.76)
年份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264	3377	2878	2997	386	380	2872	2214	386	278

注：*、**、***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另,本文中的滞后一期是指因变量的 t+1 期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表 9 的第(1)列和第(2)列分别是全样本企业家能力指数与滞后一期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关系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企业家能力对滞后一期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影响都是显著为正的,此结论与前文保持了一致。第(3)列和第(4)列为非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家能力与滞后一期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非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家能力对滞后一期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影响显著为正。第(5)列和第(6)列为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家能力与滞后一期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企业家能力对滞后一期的创新投入影响的系数并不显著,但企业家能力对滞后一期的创新产出的影响显著为正。第(7)列和第(8)列是反腐败对非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家能力与滞后一期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关系影响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反腐败与企业家能力的交叉项对滞后一期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影响都显著为正,这说明,反腐败加强了非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家能力对滞后一期的创新投入和创

新产出的正效应,也证明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在上文的结论中,得出反腐败对企业家关系网络能力的影响比较大,因此,本文在表9的第(9)列和第(10)列的回归结果中,只列示了企业家关系网络能力分项指数的检验结果。第(9)列的回归结果表明,国有企业企业家关系网络能力对滞后一期创新投入的影响为负,这说明,企业家关系网络能力对国有企业长期创新投入是不利的,但并不显著。反腐败与企业家关系网络能力的交叉项为正但并不显著,这说明,反腐败并没有减弱企业家能力对滞后一期创新产出的负效应,但这并不能得出反腐败没有达到应有效果的结论。第(10)列的回归结果进一步证明,国有控股企业企业家关系网络能力对滞后一期的创新产出的影响是显著为负的,这说明,关系网络能力对滞后一期创新产出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但反腐败与关系网络能力的交叉项显著为正,这说明,反腐败减弱了关系网络能力对创新产出的负效应,同样证明了反腐败对创新影响的有效性。

六、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1. 研究结论

本文从企业家能力的微观视角,结合反腐败的宏观背景,分析了反腐败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1)企业家能力总指数($CCEI^{BNU}$)、人力资本(EH)、关系网络能力(EN)和社会责任能力(ER)对企业创新有积极的作用,但是,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ES)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2)按照不同的产权性质分样本分别验证发现,结论中所列关系在非国有控股企业中依然存在,而在国有控股企业中,只有企业家关系网络能力(EN)对创新有促进作用,其他关系并不显著,这说明,产权性质会影响企业家能力在创新中的作用;(3)反腐败优化了企业外部经营环境,企业家能力会更多地配置到生产领域,并激发企业家创新的动力,因此,反腐败有助于增强企业家能力总指数($CCEI^{BNU}$)、人力资本(EH)和社会责任能力(ER)对创新的促进作用,但是,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ES)和企业家关系网络能力(EN)并不显著。通过进一步对企业分类研究发现,反腐败对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创新都具有积极的影响,并强化了非国有控股企业企业家能力($CCEI^{BNU}$)、人力资本(EH)和社会责任能力(ER)与企业创新的正效应,对国有企业而言,反腐败使得企业家人力资本(EH)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增强,而企业家关系网络能力(EN)不再对创新有显著的影响。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证明了以上结论。

2. 政策建议

中国正处于转型期,创新能力直接关系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企业家能力作为企业创新的牵引力,创造更加有利于企业家能力发挥的外部环境至关重要。由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积极营造培育企业家能力的环境,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并进一步明确政府官员权力的法律界限,同时,调动政府和企业的积极性,协同促进企业创新。(2)加强政府层面的反腐败力度,切断企业家寻租的通道,增加企业利用政治资源的成本,让企业家能力更多地用于企业创新。更重要的是,要将反腐败长期化、制度化,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的发生。(3)在完善国有企业高管权责机制的前提下,积极探索构建职业经理人市场,优化国有企业高管评价体系,特别是针对特定的国有企业实行市场化的经理人制度。

参考文献:

- [1] Anokhin S, Schulze W S. Entrepreneurship, Innovation, and Corruption[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9, 24, (5): 465 - 476.
- [2] Baumol W, Entrepreneurship. Productive, Unproductive, and Destructiv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 (5): 893 - 921.
- [3] Dimitratos P, Amorós J E, Etchebarne M S. Micro-multinational or not?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Networking and Learning Effect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4, 67, (5): 908 - 915.
- [4] Izquierdo E, Deschoolmeester D, Salazar D. The Importance of Competencies for Entrepreneurship: A View From Entrepreneurs and Scholar's Perspective[C]. IntEnt Conference in Reino Unido, 2005.
- [5] Hoffman, D E. The Oligarchs. Wealth and Power in the New Russia[M].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2.
- [6] Klitgaard, Robert. Strategies Against Corruption[J]. Agencia Española de Cooperación Internacional Foro Iberoamericano so-

bre el Combate a la Corrupción, Santa Cruz de la Sierra, 1998, (7):15-16.

- [7] Leff N H.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Bureaucratic Corruption[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964, 8, (3):8-14.
- [8] Mahagaonkar P. Corruption and Innovation. A Grease or Sand Relationship? [J]. Jena Economic Research Papers, 2008, (17):1-24.
- [9] Man T, Lau T, Chan K F. The Competitiveness of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A Conceptualization With Focus on 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ie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2, 17, (2):123-142.
- [10] Papadakis V, Bourantas D.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as Corporate Champ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 Technology Analy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 1998, 10, (1):89-110.
- [11] Shleifer A, Vishny R W. Politicians and Firm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4, 109, (4):995-1025.
- [12] Teece D J. Business models, Business Strategy and Innovation[J]. Long Range Planning, 2010, 43, (2):172-194.
- [13] Teece, D J. Firm Organiza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996, 31, (2):193-224.
- [14] 陈爽英, 井润田, 龙小宁, 邵云飞. 民营企业社会关系资本对研发投资决策影响的实证研究[J]. 北京:管理世界, 2010, (1).
- [15] 戴锦. 国有企业政策工具属性研究[J]. 成都:经济学家, 2013, (8).
- [16] 党力, 杨瑞龙, 杨继东. 反腐败与企业创新: 基于政治关联的解释[J]. 北京:中国工业经济, 2015, (7).
- [17] 杜雯翠, 高明华. 市场结构, 企业家能力与经营绩效——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13, (1).
- [18] 高明华, 焦豪, 苏然. 中国上市公司企业家能力指数研究[J]. 哈尔滨:黑龙江社会科学, 2014, (1).
- [19] 高明华等. 中国上市公司企业家能力指数报告 2012[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
- [20] 高明华等. 中国上市公司企业家能力指数报告 2014[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4.
- [21] 高明华等. 中国公司治理分类指数报告 No. 15(2016)[M]. 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 2016.
- [22] 公婷, 吴木銮. 关于以薪养廉有效性的探讨——基于中国的经验[J]. 北京: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2, (5).
- [23] 贺小刚, 李新春. 企业家能力与企业成长——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J]. 北京:经济研究, 2005, (10).
- [24] 贺小刚, 张远飞, 连燕玲, 吕斐斐. 政治关联与企业价值——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比较分析[J]. 北京:中国工业经济, 2013, (1).
- [25] 黄继承, 盛明泉. 高管背景特征具有信息含量吗[J]. 北京:管理世界, 2013, (9).
- [26] 李后建, 张剑. 腐败与企业创新: 润滑剂抑或绊脚石[J]. 天津:南开经济研究, 2015, (2).
- [27] 李小荣, 董红晔. 高管权力, 企业产权与权益资本成本[J]. 北京:经济科学, 2015, (4).
- [28] 李小荣, 刘行. CEO vs CFO 性别与股价崩盘风险[J]. 北京:世界经济, 2012, (12).
- [29] 林慧婷, 王茂林. 管理者过度自信, 创新投入与企业价值[J]. 北京:经济管理, 2014, (11).
- [30] 刘运国, 刘雯. 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任期与 R&D 支出[J]. 北京:管理世界, 2007, (1).
- [31] 陆国庆, 王舟, 张春宇.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创新补贴的绩效研究[J]. 北京:经济研究, 2014, (7).
- [32] 毛其淋, 许家云.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J]. 北京:世界经济, 2014, (8).
- [33] 潘越, 潘健平, 戴亦一. 公司诉讼风险, 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与企业创新[J]. 北京:经济研究, 2015, (3).
- [34] 万广华, 吴一平. 司法制度, 工资激励与反腐败: 中国案例[J]. 北京:经济学(季刊), 2012, (3).
- [35] 王端旭, 潘奇. 企业慈善捐赠带来价值回报吗——以利益相关者满足程度为调节变量的上市公司实证研究[J]. 北京:中国工业经济, 2011, (7).
- [36] 王少飞, 官峰, 高斯达, 陈雷雨. 地方政府换届与企业募资投向变更的有效性[J]. 上海:财经研究, 2014, (11).
- [37] 王文春, 荣昭. 房价上涨对工业企业创新的抑制影响研究[J]. 北京:经济学(季刊), 2014, (2).
- [38] 温军, 冯根福. 异质机构, 企业性质与自主创新[J]. 北京:经济研究, 2012, (3).
- [39] 武亚军. “战略框架式思考”, “悖论整合”与企业竞争优势——任正非的认知模式分析及管理启示[J]. 北京:管理世界, 2013, (4).
- [40] 杨其静. 企业成长: 政治关联还是能力建设? [J]. 北京:经济研究, 2011, (10).
- [41] 于风政. 论“腐败”的定义[J]. 北京:新视野, 2003, (5).
- [42] 袁建国, 后青松, 程晨. 企业政治资源的诅咒效应——基于政治关联与企业技术创新的考察[J]. 北京:管理世界, 2015, (1).
- [43] 周璐, 王前锋. 企业社会责任对技术创新影响研究[J]. 武汉:财会通讯, 2013, (3).

Anti-corruption, 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ies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WANG Jian-zhong, GAO Ming-hua

(School of Business and Administr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Facing the great pressure of domestic economic downtur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structure, enterprise innovation has become the next focu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it is an important topic for studying the influence factor of the enterprise innovation. Entrepreneur is the main part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Entrepreneur competencies determine the development track of enterprises and has the most direct and fundamental influence on the enterprise innovation. Chinese economy has experienced a rapid development after implementing the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ing”. But the economic growth has also brought massive official corruption. The rent-seeking and corruption will lead to the misconfiguration of entrepreneur competencies from productive field to non-productive field and produce the crowding-out effect to entrepreneur competencies, thus being not conducive to innovation. Accordingly, it is essential to implement anti-corruption policy to avoid the grave consequences brought by corruption. On one hand, anti-corruption can reduce the illegal rent-seeking behavior of entrepreneur. On the other hand, it can prevent the “grabbing hand” of governmental official reach out to enterprises and further facilitating all the efforts of entrepreneur can be made to enterprise innovation. After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strengthened the anti-corruption efforts. This article mainly resolves the following two problems. First, what is the impact of entrepreneur competencies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Second, whether entrepreneur competencies can be given full play in the improved government-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further promoting enterprise innovation.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d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entrepreneur competencies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using CCEI^{BNU} and further made an intensive study of the effect of anti-corrup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 competencies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current anti-corruption efforts. After the empirical examination, we dra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The promotion of entrepreneur competencies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exists between entrepreneur competencies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in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But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only exists between entrepreneur network competencies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2. Anti-corruption increases the cost and difficulty of rent-seeking, thus configuring entrepreneur competencies to production field and further facilitating the increase of R&D input. Hence, anti-corruption will intensify the promotion of entrepreneur competencies to enterprise innovation. 3. Further study found that anti-corruption has a certain role in promoting enterprise innovation for both state-owned and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For the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ti-corruption can enhance the positive effect of entrepreneur competencies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For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ti-corruption can enhance the positive effect of entrepreneur human capital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But the effect of entrepreneur network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is not significant.

Therefore, we can obtain the follow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1. Creating a good environment which can be favorable for cultivating entrepreneur competencies. Constructing a new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 and defining the legal limits of the power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Mobilizing the enthusiasm of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to promoting enterprise innovation. 2. Strengthening the anti-corruption efforts at the government level and cutting off the channels of rent-seeking of entrepreneur. More importantly, anti-corruption should be institutionalized and carried out for a long period. 3. On the premise of improving the responsibility mechanis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executives, exploring to construct professional manager market and evaluation syste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executives.

Key Words: anti-corruption; 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ies configurati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责任编辑:舟 山)